

“信”与一种存在方式

(自序)

人所要做的许多事情是由于某种精神追求才去做的。有时分明知道要做的一些事是徒劳的,但仍然坚定不移地去做,究其原因就是在人的心灵中有一种“信”的力量。

人们常说:我信。“我信”所要表达的不仅是对客体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主体的肯定。在“我信”的过程中,一个人已经彻底消除了他所要从事的一些事的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诸多障碍,而以主动、积极的姿态使愿望与目的相吻合,尽管这种吻合或者说“统一”仅仅发生在“主观世界”中,被外人看作是一相情愿的梦想,但对某个人来说却是完整的、自足的。在当下的生活环境中,也许应该更多地说“我信”,因为“信”可以确立自己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因为“信”可以增强生命的内在力量。

“信”对一个人是重要的,正是由于“信”的力量,才使那么多人默默地守护着一种东西,在急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去寻找精神的栖息地。由此,我们不妨自觉地落在“时代大潮”的后面去默默地捡拾被某些人所遗弃或者忘却的那些非常珍贵的东西,而这些珍贵的东西可能正是文学的精神内核,譬如对人的关怀以及文学之为文学的美,等等。这些东西都与文学的阅读有关,批评的责任就是在作品阅读中发现这些意义。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中,我编选了这本论文集。

这本论文集中,卷二中的文章曾以《新时期小说情感类型论》为题,于1985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过单行本,由于当时印数有限,现已难见到,故经过修订收录在此。卷一所收录的文章,是

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时 ,在导师陈思和先生指导下完成的 ,同时这部分内容也是承担上海市教委科研课题的成果。自从 1989 年陈思和先生提出“民间理论”问题后 ,我就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吸引 ,其原因在于民间本身的复杂性 ,及其所包含的现实力量和文学意义的无法回避。在日益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 ,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及其对民间文化形态的思考 ,可能会使我们更真切地触摸到一个时代的灵魂和真相 ,更真切地感悟到日常生活中“生命”的丰富 ,而文学研究的过程不就是和现实、生命对话的过程吗？

王光东

1990 年 10 月于上海大学

民间理念与新文学的民间传统

讨论中国新文学的生成、发展以及有着怎样的传统等问题,自然不能忽略与世界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同样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与本土的民间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是在乡土民间的范围内讨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因为具体到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乡村民间与他们的精神构成、文学追求有着极其深刻的内在联系,也可以说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意义的发现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方面,是与启蒙文学传统密切相关的另一种传统。

由于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知识分子从政治、教育、文化、文学等不同的角度去认识民间,对民间文化形态的价值判断就有差异,民间在他们的思想、情感世界中就有了不同的面貌。虽然,具体到不同时期,知识分子对民间的理解有所不同,在社会学、文化学的不同范畴中运用民间概念时的指涉内容也有所区别,但民间文化形态对新文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却是文学史上存在的基本事实,而揭示这一事实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确立一种怎样的民间理念。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三种民间理念作一番阐释。

早在五四启蒙文化时期,李大钊、周作人、胡适等人都明确地提出了“民间”的问题。李大钊曾倡导“到民间去”,所谓“民间”在李大钊的思想中与“农民”“农村”“平民”并无多大差异,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曾认为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劳动阶级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境遇就是中国的境遇,惟有解放农民才能解放中国。邓中夏等人响应李大钊的号召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其宗

旨是“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周作人认为“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民歌中的情绪和事实，也便是这民众所感知的情绪和事实”^①。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认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时，“民间”所指的是那些“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姬，弹唱的，说书的”^②等。显然，这里的“民间”所指涉的是作为底层的、普通老百姓所生存的那一生活空间，至于这一世界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则由于他们的价值立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虽然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等人从启蒙的文化立场，发现了民间文化形态中有益于新文学建设的内容，但主要的是在审美形式的层面上认同“民间”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所确立的启蒙文化价值立场在现实的、本土的民间文化世界中具体展开时，他们从民间中所发现的仅仅是与其启蒙思想相关的内容，属于民间自身的价值系统只是在与启蒙思想相联系时才有意义。这一民间理念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影响了文学创作，也影响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研究者从启蒙的视角来审视 20 世纪文学发展的过程时，自然会发现历史应有的发展趋向和文学具有的当代批判精神，但却隐含着一种倾向——忽略了“民间”作为文学的精神资源和对知识分子精神生成应有的当代性意义。

另一种民间理念主要体现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在 30 年代的“大众化”文艺争论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民间”的问题（只是就个人的阅读范围而言），但许多理论家都谈到了方言、民谣、短剧、绘图本小说、漫画、木偶戏、连环画等活跃于民间的艺术形式。重视这二者的根本目的在于从政治革命的立场上，运用民间的艺术形式，传播革命的观念，以达到启蒙和教育大众的目的。明确提出“民间形式”问题的是 30 年代“民族形式”

① 《歌谣》周刊第 29 号，1934 年 1 月 15 日。

② 《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154 页，姜义华主编，中华书局，1993 年。

论争中,向林冰提出的以“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他认为理想的民族形式必须以民间形式为基础;“民族形式的完成,则是运用民间形式的归宿。换言之,现实主义者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①。这个“民间的文艺形式不是大众生活的偶然道伴,而是和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一切别的形式一样,是其习闻常见的自己作风与自己气派”^②。这一民间理念显然是 猿年代“大众化”讨论中所出现的民间理念的继续和发展,只不过在提法上更加明确。“民间”所指涉的对象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转化为“工农兵”、“人民”等,但在内涵上与“大众”是等同的,没有多大的差异。由于这一民间理念主要是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出发,强调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对于传播革命观念、唤醒民众的政治热情具有重要作用,民间的文化价值在“政治改造”的过程中被部分地纳入政治意识形态的范畴中,成为政治的符号,在政治权力的倡导和推动下,又以尊重“民间”的名义,拒绝了五四以来的启蒙文学传统,要求知识分子站到工农兵的立场上来,也就是站到政治所要求的现实斗争的立场上来;“民间”的真正内涵也就被政治意识所取代,所保留下来的只是“民间”的形式。这一被政治统辖的民间理念,对于新文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它直接联系着 猿年代的左翼文学、源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和 缘-苑年代的文学创作;“政治”与“民间”的共谋所产生的文学观念,也对 缘-苑年代的新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这样一种文学观念下,显然也是难以真正地描述新文学的历史进程的,这一点已在 缘-苑年代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体现出来,不再赘述。

猿第三种民间理念是由陈思和在 缘年代发表的《民间的浮沉》和《民间的还原》两篇论文中提出的。他的民间理念与抗战以

① 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② 转引自《胡风评论集》, 猿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缘源

后的文学史发展背景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从描述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具备了以下几个特点(员)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持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政治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但都会在一定程度内被接纳,并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它毕竟属于被统治的范畴,有着自己的独立历史和传统。(圆)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与憎、对人类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在这样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的文明社会里,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形态只能是审美的,所以,它往往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源泉。(猿)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因而要对它作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是困难的。^①以上陈思和对于“民间”的解释包含有这样几层意思(员)作为自在的现实民间文化空间,它具有历史的相对性,包含了种种复杂的成分。(圆)作为审美的文化空间,它表现为以自由自在的原始生命活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这两者之间显然是既相联系又有所不同的。前者是现实的,后者是艺术的或者是审美的。其相联系的中介则是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准依底层劳动人民的价值准则、思想情感、审美标准去写作;二是站在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上去发现民间文化形态的意义并将其纳入启蒙思想系统中。前者如老舍、沈从文、赵树理、莫言等,后者如胡适、刘半农、韩少功等;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作家在这一问题上呈

① 参见《陈思和自选集》,员苑苑-员苑苑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员苑苑苑。

现的情形较为复杂,需作具体分析。^① 知识分子有了这种民间的价值立场,才能从“民间的现实社会”中发现民间的美学意义,因此理解民间至少要从“现实的自在民间文化空间”、“具有审美意义的民间文化空间”、“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这三者的相互联系和转化中分析民间文化形态的内涵(当然,在一部文学作品中,这三者是无法截然区分的,这种区分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否认民间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论点,一方面没有充分意识到民间中所蕴涵的自发的现代生机,另一方面则没有看到现实的自在民间文化空间与知识分子民间价值立场之间的关系。有了这种民间的价值立场,知识分子就有可能在“自在民间藏污纳垢”的状态中,发现具有审美意义的、诗性的艺术世界,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张炜、莫言、赵树理、沈从文等具有民间写作特点的作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也无法说明在文学史上“民间”对文学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显然,我们所理解的“民间”是多维度多层面的,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在这个“民间”中流动着精神、情感、价值原则,是主体的民间立场和客体的民间世界相互冲撞、纠缠、交流而后形成的一个艺术世界;在这样一个民间世界中,知识分子是不会仅仅以“政治观念”去理解民间,也不会放弃启蒙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的。

正如民间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是变化的,启蒙的方式也是有所变化的,当把民间看作是与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相对立的一种文化形态,并把两者的精神趋向看作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两个方面时,必然会认为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就意味着放弃启蒙。但文学史存在的事实与这种认识恰恰相反,知识分子永远无法摆脱与民间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价值原则和立场走进民间。既然民间包含有自由自在的生命力,在民间这个丰富、驳杂的世界中,多种文化因素相互纠缠生存,那么,知识分子就有可能在此发现与自己的精神相共鸣的契合点,同时也会在这种精神启示之下

^① 王光东《民间意义的发现》《上海文学》,1992(6)。

确立自己的现实文化立场。在我看来，“启蒙”在 1919 年代的文化语境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制约带来了坚守的困境，具体表现为知识分子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指导别人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时，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知识分子自身在 1919 年代的文化语境中也感到了已有启蒙观念言说的困难。也许“知识精英”注定为少数人所认同，但坚守以往思想的同时能够找到新的思想的生长点也是有意义的。知识分子试图在民间找到自由的、富有活力的、生机勃勃的文化精神，使自己的精神价值立场变得更有当代意义和现实的战斗力，显然是在 1919 年代文化语境中的一种积极的精神调整，是依托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资源，寻找新的历史情形下精神重构的一种努力。这正是陈思和在抗战以后的文学史研究中所提出的民间理念的当代性意义和文学史研究的价值所在。本文所讨论的“民间文化形态与新文学传统”这一问题，正是在认同这一民间理念的基础上，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与抗战以后的文学联系起来，进一步地讨论民间文化形态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知识分子精神生成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在这样一种“民间”视角下的 20 世纪文学有着怎样的基本面貌呢？

1919 五四时期的启蒙主题决定了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也就是用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思想来启人心智。但是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在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中所包含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五四知识分子在为民间启蒙的同时也充分地利用了民间资源。五四知识分子不仅充分重视“引车卖浆者”之流的民间语言，以适应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需要，而且还在 1919 年春发起了征集近世歌谣的运动。他们在《北大日刊》上开辟了歌谣选的栏目；“这种破天荒的文化现象，很快成为国内报刊的一时风气”^①。像刘半农、沈尹默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仅亲自搜集、整理民间歌谣，而且还用民歌的形式仿作新民歌，把民歌的有益成分引入新

①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页 1，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诗的创作中。五四时期的现代作家为什么会民间表现出如此的热情呢？钟敬文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认为：当时北大歌谣学运动的那些主持者和参与者，差不多都是致力于新文学和新文化的人；他们所以重视歌谣等民间文艺的搜集研究工作，正因为这是民主文化活动中应有的一个项目。从另一方面说，它也是对他们民主思想的一种测验或证明”^①。“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关于妇女解放、妇女的民主权利，无疑是一个引人深切注意的话题。这种时代的新思潮自然要反映到当时主持采集、编选歌谣的知识分子的脑中和笔下。……例如《歌谣选》中第**苑苑**两首歌谣，内容都是关于女子嫁夫的。……编者给它加的按语是：可以见华人蔑视妇女人格之一斑。这不是明白地表达出他对妇女问题的民主思想吗？”^②在《歌谣》周刊里，这种民主思想的倾向表现得更为显著。过去社会流行的歌谣，大半产生自广大受双重压迫的妇女的心和口，或者由她们守护、传授下来。在旧歌谣里，关于妇女生活遭遇的作品数量相当多，这种情形自然要反映到《歌谣》的文章上。因此，它直接、间接地关系妇女问题的篇章很多。“单就婚姻问题，后期就出了几个专号。”^③由上引证可见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不仅与西方的近世人文主义思潮相联系，而且与中国民间文化中所包含的民主性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民间文化形态”在五四时期并非完全作为启蒙的对立面而存在，而是在相互的联系中，在交流与选择中构成了其新思想的一个部分，是五四新文学的另一种传统。我们从五四时期刘半农、沈尹默等人的作品中不仅能够读到民歌中所具有的情致，也能看到由民间的男欢女爱所升华出的个性主义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启蒙文化价值趋向并不是完全排斥民间，在民间中同样包含着可以转化为现代性思想的资源。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李大钊等人所倡导的“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对部分五四知识分子产生

①②③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源**页、**源**页。

了重大的影响。“民间文化形态”作为被五四知识分子所意识到的一个重要文化空间,在不同知识分子的视野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类型。(员)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受俄国民粹派影响而产生的民间观。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希望就在于唤醒农民的政治热情,使农民参与到当时社会改造的洪流中,因此,他们不畏艰苦,到乡村去从事实际的宣传和革命活动。(圆)以鲁迅、周作人等人为代表,对民间持二元态度,既从启蒙立场出发,强调批判民间达到启蒙的目的,又充分吸取和肯定了民间积极健康的生命活力。(猿)还有一种类型是从新文学建设和艺术审美的角度,充分肯定民间形式的活力和美学价值,并赋予民间以现代性的精神意义,如胡适、刘半农等。这三种民间观在抗战以前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交织在一起,各有沉浮和消长,构成了复杂的文学史面貌。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在“变化”过程中不断地改变自己对民间的看法上。譬如在 1920年代中期,郭沫若等人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时,是以否认个性主义的价值而归附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为前提的,他们要做“第四阶级”的精神传声筒。因此,从价值立场说,他们并不是由“启蒙立场”向“民间立场”的转换,而是由“文化的启蒙立场”向“现实的政治立场”转换。这种转换通过“革命文学论争”到“左翼文学”的“大众化”讨论;“民间”始终没有构成精神性的主导,选择“民间文艺形式”或与“大众”结合在一起的目的,都是为了传播革命观念的需要,而这一民间观念的发展又直接联系着李大钊“到民间去”的思想。胡适虽然在 1925年的《歌谣》周刊复刊词中,对民歌的艺术形式仍然像在五四时期那样寄予热烈的肯定和赞美,把它看作是诗歌的重要典范,但已不仅仅强调“形式”的审美意义,而是与“普罗文学”和“大众语”的新诗人相比,看到了其中包含的“革命”的情绪。像沈从文这样以“民间立场”写作的作家,也从胡适、刘半农、废名等对民间的诗意审美中发现了民间对其精神、情感的巨大意义,在审美的层面上联系起了这一传统。这一审美层面上对民间的肯定,同时也渗透在左翼文学的创作中。

由于左翼作家的政治立场注定了对民间的改造性、革命性态度,所以在他们心目中的“民间”或“大众”很大程度上是观念性的,这个“民间”是浓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民间,与民间本身有多少真切的联系是值得怀疑的。但在一些优秀的小说家笔下,仍然有着来自民间的生活情韵,在审美的意义上保留了民间生活的真实。像鲁迅那样“批判民间”的启蒙文化传统,在“革命文学”论争之后,虽然缺少有力度的作品,但也在部分作品中承继着这一精神传统。抗战以前,文学史存在的这种复杂性,带来了“民间”问题讨论的难度,但从整体而言,民间文化形态是依托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启蒙文化立场而显示其文学意义的,像老舍和沈从文这样具有真正民间立场的作家在这一时期是极个别的现象,他们具有的文学史意义是在后来才被人们充分地意识到的。

1949年抗战爆发以后,民间文化形态本身所包含的巨大现实意义和文学意义,在抗战的推动下显示出了其整体性的价值。一方面,为了抗战,政治权力需要调动民间的力量(包括精神的力量),另一方面,政治权力又要改造民间的“落后性”,以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形下,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权力意志作为核心,不仅要求知识分子与权力意志保持一致,同时也要求“民间”归拢于权力意志的统辖之下。这样,知识分子、权力意志、民间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简单化了。在抗战以前所形成的“三种民间观”,在这一时期继承和发展的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以政治革命意识改造民间的思想,这一思想经过 1949 年代的瞿秋白和毛泽东的努力,使“民间”成为政治符号,并与国家权力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深远、重大的影响。而以鲁迅、周作人和胡适、刘半农为代表的另外两种民间观则退居到了文学史的次要地位,甚至遭受到严厉的否定和批判。在这一时期,权力意志不仅依靠民间、改造民间,同时也改造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须与民间、大众结合在一起,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与劳

动人民保持一致,实质上也是与政治所要求的现实斗争任务保持一致。“民间”是作为权力意志的承担者对知识分子发生作用的,“民间”与“权力”的共谋构成了对知识分子的压迫,但是由于“民间文化形态”在抗战时期被唤醒的整体意义已经被知识分子所意识到,民间本身仍然有着政治意志收拢不了的空间,并深刻地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精神的生成,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抗战以后直至 80 年代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如下三种情况:(员)与权力意志保持一致,用政治观念来虚构民间生活空间的作品。(圆)仍然坚持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表达知识分子思想、情感的作品。(猿)虽然与政治权力意志的要求保持一致,但由于与民间保持着深层的密切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是一种自觉的价值观念上的认同,使其作品在贯彻权力意志的时候,不自觉地流露出与其完全不一致的内容,用陈思和的话说就是“民间隐形结构形态”。而后两种类型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批判,前者如延安时期的丁玲和建国后“胡风集团分子”的创作,后者如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赵树理是有着民间立场的作家,他把自己的小说解释为“问题小说”,所谓“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都包含了这种意思。他所说的“起作用”,不仅仅是利用通俗方法将国家意志普及远行,也包含了站在民间的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民间的声音。当权力意志要强制收拢民间,不喜欢民间真正的声音时,这种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写作也受到了谴责,80 年代对赵树理《邪不压正》、《锻炼锻炼》的批判就说明了这一问题。通过如上分析,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国家权力意志是既不喜欢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也不喜欢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的,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表现为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之下,民间文化形态的美学意义就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单纯的政治(特别是把政治理解为一时的“政策”或“观念”时)关系是无法真正把握和理解“民间”的丰富、驳杂和实在的日常生活的,寄生于政治性的文学想像中的“民间文化因素”便往往成为作品美学意义的关

键。缘- 远年代的大部分文学作品的美学意义都来自这里。

猿新时期文学是伴随着对五四文学传统的恢复和发扬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已经在五四时期形成的三种“民间观”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体现在高晓声、汪曾祺、贾平凹的有关作品中。由于文化情形和历史语境的差异,民间文化形态之于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从这些新的因素中,虽然仍旧能够看到与以往文学之间的联系,但却有着鲜明的当代性内容,其主要代表作家分别是王润滋、韩少功、莫言。

在激烈变动的 愿年代社会中,社会变革带来了乡村民间文化形态的动荡、价值观念的冲突,许多作家从顺应历史发展的立场出发,去歌颂这种变化,批判农民身上的弱点,但王润滋、张炜、尤凤伟等山东作家,不是从“历史进步”的价值趋向上去对农民自在形态中的道德观念进行排斥,而是从民间文化的价值趋向上,执著于追寻民间道德在现实变化中的合理性。这种准依农民眼光审视社会变化的写作,使我们想到赵树理的小说,但它比赵树理的写作有着更强烈的“道德性”。这一点突出表现在王润滋的小说中。王润滋在 愿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没有否认社会改革所带来的变化和成就,但也没有廉价地认同人们趋于“经济实利”的原则,他的民间道德立场使他关心的是在“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运动中,人的道德精神世界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鲁班的子孙》、《小说三题》、《残桥》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韩少功等“寻根文学”作家则由对世界现代性的思考,在寻求“民族”与“世界”的对话过程中,重新发现了“民间本源性的存在”的文化意义及审美意义。当他意识到民族的、本土的民间文化形态,既能使本土文学获得再生资源,又是与世界文学对话的一条重要途径后,民间文化形态的本源性便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闪现了熠熠光彩。莫言是一个真正复苏了民间文化精神的当代作家,他在世界文学的启迪之下,在《红高粱家族》等作品中,在乡土民间藏污纳垢的现实文化空间中,把人的生命精神充分张扬起来,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来

自民间的审美艺术世界,表现出对民间文化形态的真切理解。

在 20 世纪年代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中,虽然可以看到来自 20 世纪年代的发展线索,但却表现了新的特质。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年代走向民间,从价值立场上说主要有两个层面(这一点在前面曾简略提及):一是知识分子从自身的启蒙立场出发,发现了民间文化世界中所具有的有意义的内容,进而使知识分子的精英价值准则与民间价值准则得到统一。二是从真正的民间立场出发,把民间文化世界作为自己灵魂的栖息地,并在其间感受着民间世界的丰厚和博大,为民间自身的深厚所震撼。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这两种立场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更多地保留了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特点,而后者则更多地保留了民间文化的特点。然而在 20 世纪年代的文学创作中,这两者往往是难以更加明晰地区分的。因为作家在走向民间的时候,往往是一个自我精神与民间不断碰撞、交流、沟通的过程,他们在拥抱民间的同时,民间也以灼热的胸怀拥抱他们。20 世纪年代具有民间写作倾向的作家所表现出的正是与民间的这种对话过程,在这种对话过程中所出现的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李锐的《无风之树》、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张炜的《九月寓言》等作品里,能深切地体会到他们对于民间大地的描述中浸透着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在他们把自己的“心”交给民间的同时,民间则给了他们抗拒压迫、守护生命的精神滋养。张炜在《九月寓言》中寻找精神的自由生长,以悲悯的情怀沉浸于民间大地上,发现民间的丰富和内在的生命活力,余华则在《许三观卖血记》中看到了坚韧、温厚的生命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抗拒着各种力量对生命的残害。这种生命精神、人道主义情怀在民间的大地上获得了新的支撑和生长的力量。民间大地是博大、丰厚的,来自这里的思想、情感、精神与文学想像也是无穷无尽的。

通过如上概括性的分析,可以看到乡村民间文化形态始终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由于民间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和自身构成的复杂性,它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就极为复杂,

在此所讨论的仅仅是与新文学的生成、发展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涉及。譬如不同地域民间的独特性对文学的影响，民间与政治意识、知识分子精神在不同时期的相互转换所带来的复杂性，再譬如都市民间与乡村民间对文学创作造成的不同影响，民间文化形态与通俗文学的关系等，只能留待以后再作进一步的思考和论述。仅就如上所论，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本土的民间文化、文学传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它与世界性的文化、文学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 20 世纪文学的内在品格，进一步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 20 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而且对于当代人的精神生成和真正中国化作品的出现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民间意义的发现^{*}

——五四新文学的另一种传统

虽然五四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意义的发现与世界文化、文学中的民间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属于本土的民间文化形态对五四新文化、文学的产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有人认为:“民间文学运动与历史深远的五四运动是瓜连蒂结的。许多民间文学运动的领导人,本身就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或崭露头角的观察者,这就使民间文学和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运动史上最可能被定性为孪生事实的两大运动。”^①这一观点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化、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

—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倡导“到民间去”,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建设新文学的愿望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受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俄国民粹派理论的影响。在“到民间去”的这一文化运动中,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的态度是不同的,从政治、教育、文化、文学的不同角度去认识民间,对民间文化形态的价值评判和行为目的也就有差异,民间在他们的思想、情感世界中也就有了不同的

* 该文发表于《上海文学》1985年第 6 期。

① 洪长泰《到民间去》,15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面貌。为了更确切地说明不同“民间”之间的差异,我们把民间区分为“现实的自在民间文化空间、具有审美意义的民间文化空间、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三个层面,并在三者的联系与对撞中理解现代知识分子所赋予民间的内涵。概括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以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为代表的与“民粹派”思想密切相关的民间观,后来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经过瞿秋白、毛泽东的努力使之成为政治符号和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符号。李大钊是最早号召青年到农村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他说:“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做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出开放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①为此,他呼唤青年人投入到社会改造的洪流中,扫除乡村落后的垃圾,担负起教育农民的使命。响应李大钊的号召,1919年11月,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等人组织了“平民教育演讲团”,该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之自觉心”^②。在他们看来,民间、农村、农民、平民的内涵是没有多大差异的,他们眼中的“民间”主要是指现实的、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是政治的、启蒙的价值立场,民间是承担其社会改造使命的场所。二是以刘半农、沈尹默、胡适、周作人、顾颉刚、常惠、董作宾等人为代表,以《歌谣》周刊为核心,在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和倡导中,发现民间文化形态的美学意义并纳入新文学的构建过程中。这些现代知识分子虽然都对民间怀有热情,但对民间的态度也是有差异的。从文学的角度说,胡适、刘半农对民间形式的生命活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从审美的角度肯定民间文化形态中的精神价值。

① 《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选集》,154-1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② 洪长泰《到民间去》,11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